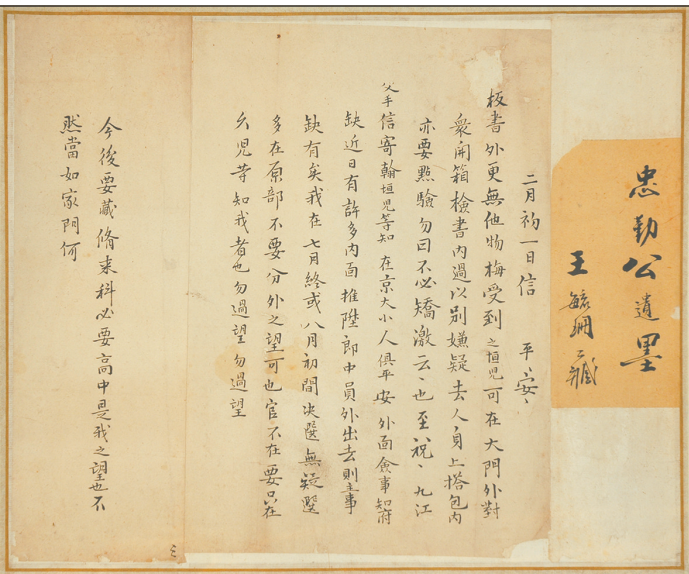


教子需从清慎起

从桓台博物馆藏一件家书说起

伊婧



家风是“礼”制在家族内部的呈现形式。家风的养成是一个家族得以延续的重要条件，影响着家族的荣辱沉浮。在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中，众多名门望族无不有着独到的家风传承。到如今，家风依然传承着家族根脉，维系着家族底蕴，“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由此可见，家风不仅对于单个家庭内部具有重要作用，还会深刻影响社会风向。家书是家风的载体，它不像家训一般谆谆教导，而是在不经意间将书信者的世界观、人生观进行传达，犹如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在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博物馆的文物藏品中有这样一封家书，虽然距今已经过去四百多年，如今读来，信中对为官、做事、读书、廉洁的理解，以及对子孙的殷殷嘱托和关怀与教导，仍令今人深受教益。

开箱别嫌疑

书信的内容为：

二月初一日信，平平安安。板书外更无他物，梅受到，之垣儿可在大门外对众开箱检书内过，以别嫌疑。去人身上搭包内亦要点验，勿勿不骄激云云也。至至祝祝，九江父子信寄翰，垣儿等知。在京大小人俱平安，外面金事、知府缺，近日有许多内而推升郎中、员外出去，则主事缺有矣。我在七月初或八月初决选无疑，选多在原部，不要分外之望可也。官不在要，只在久，儿等知我者也，勿过望，勿过望。今后要藏修，来科必要高中，是我之望也，不然当如家门何。

这封家书是目前见到的淄博新城王氏家族最原始的家书，由清初诗坛“一代正宗”王士禛的高祖王重光手书。王重光，字廷宣，明嘉靖丁酉（1537）进士，历任工部主事、户部员外郎、云中金事、上谷参议，因在贵州布政使司左参议任上平蛮督木，操劳过度，触冒瘴气，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以身殉职。嘉靖皇帝为之感动，认为“平蛮”功成为“忠君”，“督木”殉职是“勤事”，于是褒赐“忠勤可悯”，王氏后人遂称王重光为“忠勤公”。

王重光为新城王氏家族的第一个进士，列二甲49名。自明嘉靖至清末300余年间，淄博桓台新城王氏家族出进士30名，举人52名，贡生158名，出任为官者100多人，被称为“江北青箱”。王重光在从政之余，制订了王氏家族的著名家训：“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这则成文家训的要点就是“道义”“读书”四个字，旨在教导后人如何读书、做人。新城王氏族人将王重光视作效法榜样，将“道义”“读书”奉为行为准则，历第五世“子”字辈、第六世“象”字辈、第七世“与”字辈，三世的持续发荣，科甲蝉联、名宦辈出，“王半朝”横空出世。新城王氏家族已成为当地最为显赫的名门望族和蜚声海内的官僚世家。明末文坛领袖钱谦益称“嘉靖以来，其门第最盛”，明陈继儒曰“今海内推乔木世家，首屈新城王氏，名公卿累累，项背相望”。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六写道：“吾家自明嘉靖中，先高祖太仆公以甲科起家，至隆、万而极盛，代有闻人。”

这封家书书写之时，王重光正在九江主持税关工作。税关是“脂膏”所在，商贾囤积谋利，豪滑横行霸道。而王重光身居高位，廉洁自守，行事非常谨慎。王重光上任伊始，造访者门庭若市，王重光一时难以裁决，深入民间几经查访，严拒商贾送礼之风，当众将礼品投入江中说：“身处脂膏，而不能茹苦啖药者，有如大江。”遂深受百姓拥戴，豪滑畏惧，声誉鹊起。

“大门外对众开箱检书内过，以别嫌疑”。王重光在九江两袖清风，但身处高位难免会有是非，自然会引起人们对其是否贪污的猜疑。如何自证清白？从家书中可知，王重光邮寄一些书回家，嘱咐儿子上之垣在大门之外开箱示人，从而打消外人的疑虑，这既是不不得已而为之，也是他廉洁自守、谨慎行事的体现。

教子得所愿

家书中的王之垣是王重光次子，也是王士禛的曾祖父，嘉靖三十七年（1558）举人，他考中举人参加乡试的鹿鸣宴时，突然心情烦躁，后来才知道是王重光在扬州永宁督木中殉职。他与其他兄弟赴京为父亲请恤，得知要向当朝权贵严世蕃行贿才能获得赠恤后，认为以贿取得赠恤，有辱父亲亡灵，慨然回家。王之垣为父亲办理丧事后人，创办家塾。他既是学员，又是家塾的管理者，每天晚上他不睡觉，其他兄弟子侄没一人敢休息；早晨他还没起床，琅琅的读书声早开始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王之垣考中进士，初官刑部府推官，专门负责刑狱工作，后回京担任给事中、都给事中、太常寺卿、太仆寺卿、顺天府尹、湖广巡抚、户部左侍郎。王之垣去太仓检查工作，看到粮仓中有一个大斗，心生疑惑，当得知是每有新粮入仓，管理人员各支一大斗后，他责令管仓人员立即改正，并且说：“作为太仓工作人员，支一小斗都是违规，何况支一大斗！”万历十一年（1583），他五十七岁时辞官回家，奉养老母，致力于家庭建设。

王之垣为官二十余年，官至户部左侍郎，“为官拒请托”，一切皆按朝廷规章制度做事，从不拿原则做交易。居乡同样二十余年，奉行“居乡不说事”，不给地方官府出难题，不为百姓增负担，受到百姓的拥戴，体现了一个古代乡贤的高风亮节。

清慎勤传家

王氏家族第八世“士”字辈，王士禛以诗名于时，为有清一代宗匠，与朱彝尊并称为朱王。王士禛官至刑部尚书，政声显著，康熙皇帝亲赐御书“清、慎、勤”大字以示奖掖。这也是对王士禛为官、理政、处事方面的肯定，“清，即清正、清廉；慎，即宽政慎刑，慎独、慎事；勤，即勤勉于事、勇于担当”。

康熙三十六年（1697）七月，王士禛三子王启沄上任河北唐山县令，对儿子由一介书生仓促获此任命，王士禛的心情委实难安，七个月后的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在户部左侍郎任上、时年65岁的王士禛于京都书写《手镜》一册交给儿子。《手镜》共有24帖、3009字，分序言、正文、跋语三部分，正文由50条为政箴言组成。一生清正为民的王士禛践行着他“不負民即不負国，不負国即不負所学”的为官之道。纵观《手镜》，最能体现王士禛“清、慎、勤”的为官思想。“公子孙做官，一切倍要谨慎检点。做官自己手脚须正，持门第不得。”“无暮夜枉法之金，清也；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慎也；早作夜思，事事不敢因循怠玩，勤也。”“勿用重刑，勿滥刑。至于夹棍，尤万万不可轻用。”……并将其作为莅官守则，嘱咐儿子谨遵恪守。这是一个正直、仁慈而不失严厉的父亲对儿子为官准则的有意交代。王士禛希望自己朴实无华的50条教诲像一面“正容镜”，能够时时为做官的儿子正容、正心，更希望儿子把它放置床头、案边当成一本手册时时翻阅。在司法方面，王士禛坚持“人命最重，极当详慎”，不与当时权贵奉行的“愚民”政策同流。他初任扬州之时，正值郑成功沿海抗清兵败，朝廷借此严查镇压迎降抗清之人，一时冤案四起，王士禛不顾身家性命，查明案情平反冤狱，拯救了众多无辜百姓，遏制了诬陷之风，赢得百姓敬重和爱戴。

王士禛清廉自律、洁己爱民的为官思想在《手镜》中表露无遗，从中亦可看出他不但是一位身体力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清正廉洁的好官，其言行更是《忠勤公遗墨》家书内容的覆辙与实践。他还在《手镜》中这样写道：“日用节俭，可以成廉”。他身居法曹，每日只吃一两碗蔬菜，不枉费公家一分钱。在扬州为官五年“不名一钱，急装时，唯图书数十篋”，足见其严肃的工作作风和自律的生活作风，时至今日仍可以致用。至此，经过王重光到王士禛嫡系子孙五代一百七十余年的传承与努力，“忠勤清慎”成为新城王氏作为仕宦望族家风的一个重要内涵与概括。

从忠勤公王重光一封只有209个字的家书，到王士禛3009字的《手镜》宦官读本，新城王氏家风洋溢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新城王氏家族传承过程中形成的读书道义、忠勤清慎、雅重女德等内容，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构建和谐社会，必将提供积极的有益借鉴。

三门峡市博物馆藏青铜精品赏析

贾丽

河南省三门峡市博物馆位于陕州故城遗址区，是一座集文物收藏、陈列展示、科学研究、社会教育与文化交流为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1991年1月正式对外开放，现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拥有馆藏文物15000余件（套），其中三级以上国家珍贵文物1400余件（套）。馆藏文物时代跨度大、种类齐全、数量较多，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是研究和见证三门峡地区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实物例证。现选取几件馆藏青铜精品简要介绍，以供欣赏和深入研究。

饕餮纹铜觚（图1） 1973年1月三门峡市灵宝涧口公社王家湾出土。通高28.2厘米，口径16.1厘米，底径8.6厘米。喇叭形口，颈、腹修长，高足外撇，下承圆座。颈部饰蕉叶纹，其下饰夔纹。腰部、圈足上部各有四道扉棱，并饰雷纹地的变形饕餮纹，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整体造型规整，精美，纹饰繁缛华丽，给人以庄严凝重之感。1973年1月至1974年4月，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县（现灵宝市）先后出土了17件商代青铜器。这批青铜器种类丰富，铸造精美，不仅有容器，还有工具和兵器，这件饕餮纹铜觚就是其中的一件。该铜觚与安阳大司空村商代M267:2和安阳殷墟M5:63所出铜觚的器形和纹饰相近。据此推断，这批青铜器的年代约为武丁时期（前1250—前1192）或稍晚一些。武丁在位时期，励精图治，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史称“武丁盛世”。与三门峡隔河相望的平陆县前庄村1990年还出土了商代早期的青铜重器方鼎和圆鼎，可见晋南豫西一带当时已经处于商王朝统治的重要地域。

追夷簋（图2） 1995年三门峡市李家窑遗址市交警支队工地M44出土。通高25.6厘米，口径20.6厘米，腹径24.4厘米。口微敛，垂腹，圈足附三个兽面纹支足，两兽耳。有盖，盖表隆起，顶部有喇叭形握手。器盖、器身口沿部及圈足部各饰一周变形蟬纹，盖表和腹部饰瓦纹。盖内及器身内底部铸有内容相同的铭文（图3），共6行52字。铭文为：“唯正月初吉丁亥，追尹不敢昧先人之，对扬厥祖之遗宝，用侑朕皇祖中尊簋。追夷用祈眉眉寿永命，子子孙孙其万年永宝用。”这篇铭文交代了铸造此簋的时间、作器缘由、祭祀对象以及常用的祈福祝愿之辞。铭文的大意是：正月初吉丁亥日，追夷不敢隐瞒先人的功德，感谢祖先留下来珍宝，用来制作祭祀我的祖父的簋，追夷真诚地祈祷祖先赐予长寿，命运长久，子子孙孙万年永宝享用。从埋葬的地层看，M44时代早于虢国，应是“虢人灭焦”前，焦国人的墓葬。随葬品的组合表明，墓主人追夷的身份为士一级贵族。追夷簋的出土，填补了三门峡地区焦国遗存的空白，为焦国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鬲子硕父鬲（图4） 1990年三门峡市公安局追缴的虢国墓地被盗文物。通高13.4厘米，口径18厘米，腹深7.7厘米。直口，平折沿，方唇较厚，短束颈，鼓腹，平底，蹄足矮而粗壮，足端肥大。这件鬲的器腹装饰有三组曲体长鼻龙纹，每组龙纹之间隔以竖向扉棱，鬲棱呈Y形，纹样间隙填细雷纹作为地纹。颈部内侧呈逆时针方向铸有铭文一周24字：虢仲之嗣鬲子硕父季赢羞鬲，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图5）。从铭文判断，铜鬲是虢硕父为他的妻子季赢铸作的礼器。同时追缴回来的还有一件虢硕父簋，器盖、底铸有相同铭文：“虢硕父作旅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国语·郑语》载：“夫虢石父谗巧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史记·周本纪》载：“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古代“硕”字与“石”字相通。《说文》载：“硕，头大也，从页石声。”所以，金文中的虢硕父即文献记载的虢石父。他是西周周末年虢国的国君，同时还是周幽王的卿士。铭文中的虢仲，应是周厉王的卿士虢公长父、虢国的国君。西周时“学在官府”，鬲子，是

兴平市博物馆藏柳毅传书故事铜镜赏析

孙红

传奇小说《柳毅传》，见于《太平广记》，出自唐人陈翰所编《异闻集》中，由李朝威撰写。主要描写的是书生柳毅落第后，在前往告别乡人的路上，遇见一妇人牧羊，容颜憔悴。遂问而得知，妇人乃洞庭龙王之女，嫁给泾川次子，未能得幸，又蒙姑舅毁黜，甚是可恨。洞庭遥远，难以与父王通信不成，欲借柳毅之手将目前处境告知父王。柳毅深感同痛，欣然答应。柳毅遂告克险，告知洞庭龙王，几经波折，后泾川次子被龙王弟钱塘君所灭，龙女得救。几经周折后，嫁于柳毅，终成眷属。故事内容展现出奇异的浪漫色彩和清新俊逸的风韵。情节也离奇曲折，富有戏剧性，自唐代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兴平市博物馆藏“柳毅传书镜”体现的正是龙女得救后与柳毅依依惜别的场景。柳毅传书结良缘，有着美好寓意和文化内涵。

宋代柳毅传书故事铜镜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上面的铭文。在镜面中间偏右，有一方框，内有铭文“河中府马白同镜”八字。铭文中的“同”通“铜”。“河中府”是地名，始建于唐开元年间，据《旧唐书》卷四十三《志》《第十九地理二》记载，河中府属河东道。河中府之名最早自唐代开元年间出现。在宋金时期，河中府又经历了数次改元。《金史》记载：“河中府，散上。宋河东路。旧置护国军节度使，天会六年降为蒲州，置防御使。天德元年升为河中府，仍旧护国军节度使。大定五年置陕西元帅府。户十万六千五百三十九。县七、镇四。”由此看来，历史上的河中府就在今山西省永济市西南蒲州镇一带。铭文中的“马家白同镜”应该指的是此镜为姓马的工匠或作坊制造。

宋代人物故事铜镜出土较多，主要以具有浓厚



宗教色彩的神仙故事为题材，采用粗线条画法，用浮雕法处理。诸如仙山楼阁、云中凤凰、山谷云绕、寻仙仙境，使画面呈现出超凡脱俗的神仙意境。有的故事题材所表现的内容能从史籍记载中找到，如柳毅传书故事镜、童子攀枝镜、许由巢父故事镜、吴牛喘月故事镜、带柄人物故事镜、萧何追韩信故事镜等等，多为中原地区广泛流传的历史故事被用于铜镜上。从整体看，铜镜的纹饰艺术水平很高，内容丰富，人物的造型优美古雅，表情也很丰富，包括其中的树木、花卉及动物的塑造技法，细腻生动活泼，具有立体感。构图繁缛，饱满、华丽，人物的姿态简练明确，风格朴实，在对人物时，表现了当时社会的风俗与人们的生活及爱好，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展示了宋元时期的铸造艺术特征。

柳毅传书镜的内容是一部深刻揭示社会不公和人性弱点的作品，同时也展现了人类的勇气和智慧。柳毅凭着一颗勇敢、坚定的心，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个过程中，他没有依靠任何人，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勇气，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创造了自己的价值。这个故事启示人们，只要有一颗勇敢和坚定的心，就能够克服任何的困难和挫折，兑现自己的诺言，人生就一定会有好的结局。

兴平市博物馆收藏的这面“柳毅传书”镜，是以“柳毅传书”故事为背景，镜背装饰画面描绘了“泾水托书”这一场景。从各地收藏和出土“柳毅传书”镜的情况来看，这类题材的铜镜在这一时期乃至后期非常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一时期社会意识、生活时尚和审美观念以及铜镜铸造工艺水平和人们的精神生活，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



秦时期青铜壶的重要实物例证。

博山铜熏炉（图7） 2001年三门峡市区向阳汉墓出土，通高24厘米，炉口径9厘米，底径18.8厘米。器身下为一圆盘，盘中心为一仰首游动的龟，龟背上站立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凤凰引首向上，口衔圆珠，上承博山熏炉。炉身子口内敛，扁球形腹，炉盖饰山峰叠嶂，层峦高耸，镂空错落分布其间。博山炉作为一种造型特殊的熏炉，炉盖高耸如山，模拟仙山景象，饰有灵兽、仙人，镂空有隐蔽的孔洞以散香烟。炉下常设有贮水的圆盘，汉代熏炉数量多，种类丰富。材质以陶炉、釉陶炉、铜炉为主，器型有博山炉、鼎式炉、豆式炉等多种样式。博山炉以山形为主题，间杂四神、瑞兽等装饰，体现了汉代的思想文化，尤其是流行于汉代的求仙思想，也见证了西汉时期熏香之风在以王公贵族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的盛行。

真子飞霜镜（图8） 1994年三门峡市黄河路西段电业局工地唐墓出土。直径30.9厘米，八出葵花形，龟钮。钮上方饰云山日出纹，下方饰池水山石，池中生出一枝莲叶，即为钮座。左侧一人戴冠博带，坐而抚琴，前设几案，后依竹林。右侧一凤，舞于石上，凤上方有两株神木。外区为一周铭文带。镜背不上整个画面气韵生动，层次鲜明，构图复杂而又工整完美，诉说着千年前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该镜阔大厚重，做工精良，纹饰清晰，虽历经千年沧桑，依然熠熠生辉，是一件难得的唐代铜镜精品。更为可贵的是这面镜外沿处有一圈四十字铭文诗，字体为小篆，铭文为：“凤凰双镜南金装，阴阳各为配，日月恒会，白玉芙蓉匣，翠羽琼瑶带，同心人，心相亲，照心照胆保青春，相。”镜铭“日月恒会”应为“日月恒相会”。“相”字因铸造失误，排至文末。据学者研究，清代冯云鹏、冯云鹤在《金石索》中将其命名为“凤凰双镜”。这首铭文诗无疑是一首爱情诗，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相爱之人的思念和祝福，以及对真挚爱情和美好婚姻的向往。真子飞霜镜的镜背纹饰构图饱满、内容丰富，蕴含着丰富的道家元素和思想，表达了人们憧憬飞升成仙、祈求长生不老的美好愿望，以及对美好爱情和圆满婚姻生活的向往，是研究唐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

明代铜俑（图9-12） 1986年3月，公安部门发现位于灵宝大王乡南营村的明代许氏家族墓地的三座墓葬被盗，待案件破获后，缴获了58件明代铜俑。之后，三门峡市博物馆收藏28件，河南博物院入藏30件。三门峡市博物馆藏的28件铜俑，每件通高24厘米至38厘米，均立于长方形铜座上，座高5厘米，全系青铜模铸而成，其中8件侍奉俑，5件女乐俑，15件仪仗俑，姿态各异，栩栩如生。该铜俑组成一支高官出行的仪仗队，浩浩荡荡，威震四方。

女乐俑，高发髻上挽着头花，身着束腰长裙，或抚琴、或弹唱，呈现为主人演奏状。如持琵琶女乐俑（图9），通高26厘米，头挽高髻，上着右衽窄袖绣花长衣，下着及地长裙，足蹬尖头履，站立于几形平座之上。双目平视，口唇轻吐，面露微笑，姿态充满动感，怀抱琵琶，左手扬扶着琵琶柄端，右手抚弦作弹奏状。品箫女乐俑（图10），通高25厘米，头发挽成双髻，耳戴耳环，上着右衽齐膝带花衣，下着长裙，裙纹自然下垂，足蹬尖头履。口涂殊红，面带微笑，站立于方形平座上。

一件捧盒男侍俑（图11），通高38厘米，头戴幞首，身穿广袖交领长袍，腰间束带，足着圆头履，面部圆润，神态恭谨，双手捧圆盒，上身前倾，立于四足平座之上。

仪仗俑则是另一番模样，他们端庄肃穆，虔诚恭敬。如一件持杖仪仗男俑（图12），通高25.8厘米，头戴毡帽，身着交领窄袖长衣，衣过双膝，腰束宽带，足蹬深筒靴，右手叉腰，左手执杖，靠于左肩，身前倾，双脚站于梯形桥足平座之上。

灵宝许氏家族在明代中后期是名门望族。自明宪宗成化年间至明世宗嘉靖年间，许氏父子先后出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等，当时就有“许半朝”的美誉。这组铜俑雕琢精细入微，人物造型栩栩如生，神态刻画逼真，线条流畅而富有质感，件件都是精美之作，既表现出高官出行的威武场面，又展示出高官日常的生活内容，同时也丰富了明代随葬品像的研究资料，对研究明代雕塑艺术、造像艺术、丧葬习俗、服饰文化等有着积极的意义。